

November 2013

A Critique of Derrida's Deconstructive Mode of Thinking

Bing L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 Bing. 2013. "A Critique of Derrida's Deconstructive Mode of Thinking."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6): pp.178-18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6/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德里达解构思维方式批判

李 兵

摘 要:“解构”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 20 世纪后期影响甚大,但对之也存在诸多误解。德里达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突破并非是非理性的破坏,而是做了严密的逻辑分析,其异质性思维中包含两个重要的视角:时间和他者。德里达的跨界书写暗合了后现代的去分化的思维,使艺术边界问题的讨论更加复杂。其思维的主要局限在于还原论思维,语言被还原为超级主体,作者的权威得以重新返魅。语言的自反性使用导致德里达的文本处于自我解构的困境,被众多批评家诟病为双重逻辑,其思维方式中的前逻辑却一再被遮蔽。

关键词: 思维方式 双重逻辑 局限

作者简介: 李兵,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电子信箱: qjlibing@sina.com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CZW00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YJC751041)、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南民族文化与文艺理论研究”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

Title: A Critique of Derrida's Deconstructive Mode of Thinking

Abstract: Despite of misunderstanding, deconstruction as a kind of way of thinking has inserted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Derrida's undermining of the dualistic way of thinking may not be taken as an irrational destruction, but as a rigorously logical analysis. The heterogeneous way of thinking contains two important perspectives of time and otherness. Derrida's cross-disciplinary writing implicates a post-modern thought of dedifferentiation, which further complicate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arts. However, the main limitation of Derrida's mode of thinking lies in its reductionist way of thought, in which language is reduced to super subject and the author's authority is re-enchanted. The reflective use of language leads to the self-deconstruction of Derrida's writing, which entails a double logic, while the pre-logic underlying the double logic has all the time been concealed.

Key words: mode of thinking double logic limitation

Author: Li Bi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Qujing 655011,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theory. Email: qjlibing@sina.com

思维方式是哲学思考的前提,它塑造着人的行为方式甚至文明的类型。解构主义被视为反理性主义的极端,争执的背后实质上是思维方式的冲突。现代性的问题是现代人的思路或思维方式出了问题,德里达对现代性的逻辑加以反讽式的使用,自反性批判构成了解构的思维方式和前提条件,并引发了后现代思维方式的变革,也使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变得难分难解。

一、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超越

在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反思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对二元对立思维的突破。二元对立思维发源于古希腊哲学,如理念与摹本、声音与文字、本源与事物等的对立,到了近代,笛卡尔等更是把二元对立作为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他确立了主

客二分的原则。到了现代,结构主义者认为二元对立是事物的深层结构。对二元对立的超越首先出现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反思中,此后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不断寻求着克服传统二元对立、突破传统思维方式的途径。国内的一批学者也开始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如朱立元教授认为“新世纪中国美学学科建设如有大的突破,关键恐怕还是要突破、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9)。由此,分析德里达的思维方式,首要的就是分析德里达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变革和突破。

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黑白、男女、阴阳、曲直等二元划分,是对复杂多元事物的抽象化和简化,方便人们治理、控制世界,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价值的构架和意义的来源。但是二元对立思维也存在极大的局限性,首先就是对事物复杂状态的漠视,一个东西非黑即白,忽略了无限复杂的世界中存在着许多中间状态,这种思维方式往往和专制、和权威联系在一起,在文革时,这种思维方式还嵌入了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重对立。由此看来,二元对立的简化方式在今天多元化的社会已经难以立足,必须加以革新。其次,现代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是随后各种现代性思想进一步分化的基础。主客二分的对立中,主体是征服者又是臣服者,最终现代理性演变成了工具性的支配意志。最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在场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在二元对立的体系中,对立的双方地位不平等,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前者更根本、更基础,后者是次要的、派生的,德里达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的解构就是要推翻这种等级关系,逆转对立的两级,肯定边缘的、非中心的事物存在的权利。

为了解构这个二元对立的等级体系,德里达采取的并非是非理性的破坏的方法,也并非简单把二元对立的两项的秩序做了尼采式的颠倒,而是作了严密的逻辑思考和细致的分析,其大致思路有:其一,使用现实中无法加以归类的特殊事物来推翻二元对立,比如“药”、“处女膜”等展示了事物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为人们开启了认识世界的新方式。其二,采用了所谓“前逻辑”的方法,德里达称之为“幽灵逻辑”。他将存在的既彼亦此、非彼非此的状态称为幽灵状态,他认为马克思

是幽灵,作为幽灵,它既无法在场,但又在未来被召唤出场。他说“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如此这般地重视幽灵的逻辑,那是因为它将我们引向了一种对于必然超越于二元逻辑或辩证逻辑之外的事件的思考”(《马克思的幽灵》90)。所以,德里达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超越不是破坏,不是否定,而是面对后现代的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思路 and 办法。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诺里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德里达》一书中,他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力证德里达与后现代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不同“然而,我仍然要证明的是,我们更严重的错误乃在于将德里达与后现代之非理性主义一类混为一谈,而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对这种非理性主义表示过认同”(201)。不过,话说回来,德里达对二元对立的颠覆也不是没有危险,鉴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对边缘和非中心的长期压制,他颠覆较高一方特权的同时,又过分赞赏边缘的、次要的一方。譬如他在解构语音中心主义时,颠倒了二者的位置,把文字看成是先于、高于语音的东西,无形当中,造成了以一个中心取代另一个中心的局面,细细品味,其中不乏德里达的文化政治的意识,德里达坚持认为“解构不是‘中立的’,它要‘干预’”(《多重立场》118)。至于如何干预如何介入,德里达没有下文。从后现代文化多元性诉求看,德里达对传统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超越是成功的,其中也有一些建设性的因素。

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其追求的目标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相符合意义上的所谓客观真理,坚持“非此即彼”的独断论。而德里达采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反其道而行之,倡导“或此或彼”的选择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现代性是单一的思维方式,因为它从既定的前提和假设出发,寻求与之相符的结论。而后现代性则是多元的思维方式,主张废除任何假定的前提和预设,否定性和开放性是其基本特征,突破了传统封闭僵化的思维,极大地释放了人们的想象力。

二、求异——逆向式思维

德里达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超越,其思维方式在心理学上叫做求异思维。异质性思维是德里达思维方式的核心,一直贯穿其作品的始终。求异思维的要领是:大胆质疑,于无疑处生疑,由

此生发出新的创造性的新思想、新方法。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求异思维,可以说,没有质疑,就没有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突破与创新。在中国的传统里,有“和而不同”的思维,但更主要的是所谓“求同存异”的思维,求同思维总是要求思维和观念的一致性、一元性,进而排斥人们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新的合理的元素,放弃独立自主的思维和批判质疑的习惯,盲目跟从,迷信崇拜横行,久而久之,必然导致思维和行为的僵化,甚至引发文明的退化。

而求异思维的特点是跳跃性大,不按逻辑套路严密推进,意在出新出彩,所得结论与原有结论处于矛盾对立的关系之中。以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为例,求异——逆向式思维否定了现有关于结构主义、现象学的结论,从结论开始追根溯源,进而逆转现有的结论,或者直接倒果为因,比如传统的看法是言语或声音对文字有优先性,“文字是一个陷阱,它的活动是邪恶的和专横的,它的不轨行为是怪异,‘畸形的病例’,‘语言学应该有一个专门部分来考察它们’”(《多重立场》29)。误读之发生,在索绪尔看来,就是文字对言语败坏的结果。卢梭不信任文字,视文字为危险的替补。德里达却认为文字才是更根本的,语音中心主义暗含了特权意识形态并与神学和形而上学形成共谋。为了解构这种语音中心主义,德里达创造了“原文字”(archi-écriture)一词,“原文字”并不和一般的文字一致,而是言语和文字共有的,文字之前没有语言符号。一般化的书写痕迹总是已经开始,所有的都是一般本文,本文/本文之外的对立就不存在了。由此,“原文字”打破了语音与文字的二元对立,言语本质上就已经是文字。

逆向式思维是从结果—原因的顺序来进行逆向推理,结论是错误的,就会追溯其最初的原因是什么,从而修正最初的假定的原理或原因,这中间充满了动态的、矛盾的冲突。德里达的文字学的思维方式就是这种典型的逆向式思维,其中有两个视角:时间、他者。对原初文字的追问是时间性的,追问的结果是“原文字”,再追问下去呢?德里达认为延异是更为原始的东西,“痕迹事实上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绝对起源。这无异于说,不存在一般意义的绝对起源。痕迹乃是分延,这种分延展开了显象和意指活动”(《论文字学》92)。延异延迟自己并书写自己,延异是本源之本源。

延异,按照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娜·豪威尔斯的归纳,她认为有四个意义,即“延迟和非同时;区别;差异及最后意义的生产;特别是实体本体论的差异的展开”(165)。延异不仅是空间的差异,还是时间的差异。时间与形而上学紧密相连,形而上学是在场形而上学,所谓在场就是现在。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是前后运动的数,时间从现在出发,以现在为界限被规定,他说“没有时间就没有‘现在’,没有‘现在’也就没有时间”(126)。亚氏的时间观是把现在作为测度的工具,海德格尔称之为流俗的时间观。海德格尔从时间的角度来领会存在,但认为传统的流俗时间观遮蔽了存在,所以必须革新传统的时间观念,他认为时间性不是存在者,时间性不存在,而是到时候,他说“我们把如此这般作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面统一起来的现象称作时间性”(387)。海德格尔打破了传统的静态的时间观,使主体以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将来,领会存在。但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是矛盾的,他时而从当前出发去追溯一种关于在场之存在的更源始的思想,时而质疑这种源始规定本身,视之为封闭,希腊—西方—哲学的真正封闭,这种双重姿态导致了海德格尔仍然在形而上学内部进行置换。所以,海德格尔的时间观仍然是流俗的时间观,他把时间与存在联系起来解释,存在,即当前,即在场,即现在,由此,存在的意义还是无法摆脱在场、当前这种时间样式。德里达的破解之术仍然是逆向式的,他认为“为了超出形而上学,必须有某种踪迹被铭刻在形而上学的文本之中,这种踪迹继续在指示着,但已不再指向另外一种在场或在场的另外一种形式,而是完全指向另外的文本”(“Margins”65)。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遗忘了本源——延异,它比存在还要古老,正是它规定了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差异的踪迹即延异才是时间性的绽出。

总之,逆向式思维方式在德里达那里主要是时间性的,其目的是为了引出延异、踪迹等解构哲学的基本观念和范畴,当然德里达也并没有完全抛弃空间性思维。在西方,时间与空间并非是并立的范畴,黑格尔就认为空间就是时间,海德格尔也是从时间来领会存在的,所以,时间性的思维方式暗含了空间性。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时间主要指物理时间,而没有海德格尔所言的时间性或时间意识的思维方式。其思维方式主要以空间性

为主,从古代的经世致用思想到近代的中体西用以及现代大量引进西方思想来代替本土理论的创新,都是把理论当作一种工具,追求理论对当前事物的有效阐释,缺乏面向未来的动态的时间的观念,束缚了我们展望未来、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思维。由此,中国文艺理论的创新必须在原有的空间思维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时间性的思维方式。

三、越界思维

广义上理解,超越性思维都可以称为越界思维,也就是打破思维定势,突破传统而独辟蹊径。狭义地理解,越界思维,指的是跨界思维,比如人们常说的跨学科思维,文学中的文体越界等,把本来不相干的两样东西联系起来思考,就是越界思维。两种理解的相同点是突破界限、突出创新。解构书写就是越界书写,在讨论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中,在讨论绘画边框的所谓“附饰逻辑”中,德里达频频使用越界思维,诺里斯认为“德里达的文本影响了一种阈限写作的观念,这种写作想要消除在哲学和其他不规范的话语形式之间确立起来的传统边界和缓冲地带”(86)。而频繁的越界游戏以此表明思想的随机和不确定性,则是典型的后现代特征。

日常生活中越界现象普遍存在,在很多非文学领域,我们可以发现文学的身影,表明非文学形式可以越界获得文学性。如在消费社会中,广告成为了文学的栖息地和受益者,广告等非文学作品往往模仿文学的手法来获得文学性,借此来达到推销产品的目的。语言与文化中存在的两歧现象,也是越界的体现,如汉语中的“一”既可以表示少,又可以表示多。乱伦禁忌既是自然又是文化,等等。德里达使用越界思维就是从文化中边界模糊的事物出发来施行解构的,他特别偏爱使用这些不确定的词,如“药”、“处女膜”等这些边界模糊的词,来揭示文本的双重性:肯定与否定、好与坏、真与假。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都贬低感性认识,寻求一种独立于感官认识的理想知识,黑格尔却赋予听觉优先性,认为它比视觉理想,因为耳朵能倾听到身体内部颤动的结果。德里达认为这仍然是一种自我在场的言说具有真理自明性的偏见,耳朵的“鼓膜”构成这种独特的隐喻中关键的环节,鼓膜超出了内耳与外耳的对立,鼓膜把

耳管、耳道、通道等环绕的器官与外部各种干扰声音连接在一起,耳朵作为理想的器官能保持内心的宁静的说法是靠不住。“鼓膜”一词在哲学的隐喻中扮演了一个不确定的角色,德里达进而质问道“那么,在何种条件下,人们才能为一般的哲学素标示一个界限,一个边缘,对于这个界限或边缘,哲学素不能在征用过程的生产或拘制之前无限制的反复挪用,或认为那是它本身所有的?”(“Margins” xv)。鼓膜的哲学隐喻表明了哲学的边缘会进犯核心文本,鼓膜无所不在,它拒绝被安置在概念或逻辑对立的固定秩序中,哲学因此不再拥有终极真理提问的特权。

德里达的书写经常故意模糊文体和学科的界限,在哲学与非哲学,诗歌与散文的边界上书写。德里达认为解构是哲学的某种非哲学思想。在他看来,文学作为一种书写形式,有些文学作品常常比某些哲学作品更有哲学思想,因此也更有解构力量。在西方的思想史中,关于文学的论述主要是由哲学家完成的,文学观念只是他们哲学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哲学与文学一直是对立的,这个对立始于柏拉图。柏拉图的理念论、摹仿论把理念看作是万物的原型,感官所感知的只是个别的、可感的现象。哲学高于文学,文学附属于哲学,文学艺术与真理隔着三层。为了解构这个等级关系,德里达进行了跨界思维,把文学与哲学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中到处充满了修辞和虚构,两者并非是不可公度的。按照德里达的说法,文学与哲学都可溯源于“原书写”,都有文学性,都使用了隐喻的修辞方法。他认为,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以隐喻为基础的,柏拉图以理念为原型,万物分有理念,是理念的影子,这些都是比喻。在洞穴寓言中,日光被喻为理性,等等。由此,哲学的这种优先地位就荡然无存了。德里达的著作《丧钟》(Glas)讨论文学与哲学的边界问题,其理论的演示具有文学色彩。书的每页左半部分讨论黑格尔的家庭观念,右半部分引证让·热奈特的作品,书页还不时出现德里达的注释。德里达这样做无非就是表明哲学并不高于文学,哲学与文学经常相互越界使用对方的思维方式。基于德里达跨界思维中的隐喻特性,琳达·哈琴认为“很难将巴特和德里达视为单纯的理论家而不是作家”(75)。实践也表明,更多的文学研究者而不是哲学家引

用德里达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的越界思维并不是要借文学来终结哲学。相反,德里达认为哲学是不可取代的,探讨哲理需要哲学,不探讨哲理也需要哲学思辨,他引用列维纳斯的话说:“如果我们不会读圣经我们就不可能拒绝它;如果想要把握语义学就必须通过哲学,如果需要的话,要想终止哲学话语也必须通过哲学辩论”(《书写与差异》273)。所以,如果把德里达的著作看作是文学作品,就忽视了其看似尼采式结论背后复杂而又精致的论证过程,其目的在于在哲学的意义之外质疑哲学,打破哲学理性的统治地位。

现代性的思维方式是“分化”的思维,或者说划界的思维。康德把知识领域划分为知、情、意三个部分,发展到今天,知识领域的分化已经到了“隔行如隔山”甚至“隔专业如隔山”的地步。后现代流行所谓的“去分化”的思维,主张知识领域之间打破界限和隔阂,取长补短,这极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多元化、多角度、开放的心态去思考问题显然是更有效的思维方式。虽然德里达不是越界思维的首倡者,但他的解构思维暗合了后现代的“去分化”的思维,因而被后现代主义者所追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现代文学艺术热衷于进行所谓的越界游戏,有的艺术展或广告展就取名为“越界”,于是出现了文学的泛化、审美的泛化等问题,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文学艺术边界、思维方式的划界问题又再次成为了文艺学的热点问题之一。

四、还原论思维

解构主义的语言观如前所述,认为语言符号是一种先验所指不在场的游戏,所谓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表明德里达的思维具有语言还原论的倾向,语言被还原为超级主体,就像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中的一架闲置的发动机。还原论思维,化繁为简,也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方式之一,其基本原则是:任何事物都可以简化为基本的组成元素,任何复杂的程序都可以从简单的角度切入。西方公认的第一位哲学家也是第一位还原论者是希腊人泰利斯。泰利斯认为,水是万物之源,空气是水,物质是压缩过的水。他的还原论在今天看来显得过度简化,这也是还原论者易犯的错误。但也不乏优点:还原论化神秘为简单,好比把事物

翻译为一种简易的语言。亚历山大的“哥丹结”思维就是成功运用这种思维的典范。很多大哲学家其实就是还原论者,弗洛伊德把人类的经验还原为性,马克思则把之还原到经济层面。

有人认为德里达虽然反对结构主义,但其骨子里仍然是结构主义的,语言还原论就是证据。从解构理论的语言观来看,主要是秉承了结构主义特别是索绪尔的语言观。索绪尔关于任意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对德里达的“延异”观影响很大,延异的语言观,在原有的差异性思想基础上引入了时间的维度,从而打破了结构主义的静态的、空间的差异观。“在自身的某些方面,延异肯定只是存在的或本体论差异的历史性或时期性的展开,延异中的a标志着这一运动的展开”(“Margins”22)。延异造成间距化,即空间的变化着的时间和时间的变化着的空间。正是因为延异,才有语义的运动,“延异是诸差异之非完全、非简单的、被建构的和区分的本源。于此,本源之名对它也不再合适了”(“Margins”11)。延异甚至是无法命名的,它比本体论的差异或存在的真理更古老,存在的意义于是成了无底棋盘的游戏。德里达把存在的意义还原为延异的游戏,彻底切断了语言与语言之外的事物的联系,语言成了自我指涉、自我反射的所谓“能指漂浮物”。

德里达的语言还原论是20世纪文学理论言论转向的重要表征之一,这种思维方式在后现代遭遇到了自然科学研究者的挑战,物理学家索卡尔指责法国后现代理论家盗用自然科学看似深刻的语言来胁迫读者,表述自相矛盾,缺乏清晰性,并说“我们尤其想要解构某些因为其中有深刻思想而让人头疼的作品的声誉,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将展示如果这些文本是难以理解的,那么最好的解释就是它们什么也没有说”(qtd. Davis 10)。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就像光着屁股的皇帝欺世盗名,是彻头彻尾的骗子,他请所有认为实在是社会(语言)建构的人从十二层办公室的窗户跳出来。在这场争论中,存在着美国科学家与法国哲学家的文化差异导致的相互误读。而从自反性理解的角度反思,争论的双方都存在两极化的立场。问题的关键不是实在是否存在,而是实在如何被解释。这些指责都忽视了德里达文本的政治意义,通过否定语言的终极意义来否定权威,最终导致制度的改革。伊格尔顿认为“解构批评最终

是一种政治实践,它试图摧毁一个特定的思想体系和它背后的整个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系统藉以维持自己势力的逻辑”(162-63)。显然,索卡尔的实在论对此无能为力,“窗户论”显得简单而又粗暴。反观之,语言还原论是一种行动无力的表征,甚至有意或无意地帮助维持和加强着政治制度的假定。语言还原论是一种乌托邦的思维方式,语言成了美学的中心问题和理想境界,菜谱、服装、梦、电影等一切文化现象都被看作拟语言,并试图制造一种理想的、上帝式的语言。语言成了新的超级主体,而制造这种语言的作家成了新的上帝,和索卡尔所言的“光着屁股的皇帝”遥相呼应。人类学家桑格仁(Sangren)这样评价语言还原论“如果‘文本’的权威如同某些文学评论家所暗示的那样有效,那么作者就是国王了”(283)。因此,文本成了被赋予神秘力量的超级主体,被解构的作者又借尸返魂,成了特殊权力的在场。“换句话说,通过使文本的权威代表普遍的文化权威,文学批评家作为那种权威的制造者和解构者,把他/她自己放在一种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位置——如果不是一个国王,至少也是一个高级牧师”(283)。为了对抗在场形而上学,德里达发明了延异的游戏,但当德里达宣称延异是本源之本源时,德里达成了形而上学捕蝇瓶里的苍蝇,无法找到逃脱的路径,其中,尼采式的权力意志,独断式的断言又成了终极的在场。

所以,德里达的语言还原论使符号的意义彰显成为一个过程、一种进行时,而不是指向所谓的先验所指。形式层面的语言还原论思维过于简化,就成了极端的形式主义,由此,德里达走向了美学的还原主义,眷顾于延异的、不在场的美学游戏,其中语言的决定作用被过分夸大了,同时使得作者的幽灵得以返魅。

五、双重逻辑:德里达思维方式批判

德里达是从传统形而上学内部的思维方式入手进行解构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只有深入形而上学内部,才能对其实施解构。他发现原逻辑是一种“药”的逻辑,即双重逻辑,或者说双重思维,药既指良药又指毒药。而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人们往往只使用单一的意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逻辑只是善的、好的、真理的象征,另一前

逻辑的意义被遮蔽了。所以德里达的解构思维就是要恢复这种双重逻辑,恢复既是又不是或是在与不是之间的逻辑,打破形而上学独霸天下的局面。

一种观点认为,双重逻辑是自杀式的逻辑,因为解构陷入了自我指涉的困境。其解构的操作,在解构文本的同时,也使自己的观点被拆毁,所以,解构的程序被称之为“锯断坐在屁股底下的树枝”(卡勒132)。艾布拉姆斯也认为“他(德里达)可以被原则上认为是一个语言中的双重操作者,将标准的和解构的这两种语义规则玩弄于鼓掌之间”(257),并认为这种双重逻辑来自于海德格尔的“在删除下写作”。这些批评看似很有道理的,但实际上并没有抓住解构逻辑的要害。因为我们仍然可以追问,双重逻辑是否有学理上的依据?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的确不存在所谓的“双重逻辑”。形式逻辑中贯穿了一条最基本的思维原则:非此即彼,这是二元对立思想的逻辑基础。批评德里达逻辑错误的人忽视了一点,就是德里达并不是要否定排中律等逻辑,德里达攻击的是传统形而上学中束缚人们自由思考的思维方式,并不是所有形而上学都应该受到攻击的。所以,在排中律和二元对立之间完全划等号是错误的,排中律是形式逻辑的基本原则之一,二元对立则是排中律滥用的结果,两者不能完全等同。比如在“有”和“无”之间没有中间项,但在“黑”与“白”之间有中间项。二元对立的滥用就是在明显不能划出明晰界线的地方,划一条明晰的界线,就犯了“非黑即白”的错误。德里达要我们思考在形而上学的分形之前的混沌,比如,追问声音与书写分裂之前的共同的“本源”,那使它们得以可能的共同条件。声音与书写已经处于二元的分形之中,解构的逻辑就是返回二元对立之前的使得两者得以可能的共同的本源,即原书写。德里达对胡塞尔的指示与表述的二分法批判使用了同样的逻辑。德里达在批判流俗的时间观时,认为时间和空间有一个共同的本原,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出现了一个小词“hama”,是打开又封闭了形而上学的钥匙,它意味着“聚集”和“同时”,“它说的是时间与空间的共谋性和共同本原,是作为存在之一切显现条件的共-显。在某种意义上,它说的是作为最小单元的‘二元’”(“Margins”56)。但是亚里士多德没有注意到这个小词所言说的东西的自明性,这个原本的复合的二

元表明了“hama”已经是分形的差异 或者说延异。

由此看来,双重逻辑并不是说在同一文本中要使用两种自相矛盾的逻辑方式,而是说单一的线性逻辑得以运行的背后还存在被人们遗忘和抛弃的隐性逻辑——前逻辑,这实际上是一种非线性的尚未分形的混沌思维。比如“方的圆”是不可能的,但这种不可能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综合,没有这个综合,我们连这个不可能都不可能说。如何超越形而上学权威的压制?德里达的从思维方式的角度为我们探索出一条道路,这就是非线性的时间思维方式,一种尚未分形的混沌思维方式,它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将问题由简单变为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思维向混乱的退化,而是在“忽略细节所致过分简单化选择与过度复杂化以致放弃直接决策与行动之间走钢丝”(布里格斯等 94)。所以,德里达的双重逻辑要求我们在形而上学的标准与个别特殊之间保持一种反思的平衡,以此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而至于如何找到这个平衡点,从复杂再回归简单,这是德里达没有告诉我们的,这也是未来哲学前进的方向。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M·H·艾布拉姆斯《以文行事》,赵毅衡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0 年。

[Abrams, M. H. *Doing Things with Text*. Trans. Zhao Yiheng, et al. Nanjing: Yilin Press, 2010.]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

[Aristotle. *Physics*. Trans. Zhang Zhumi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82.]

约翰·布里格斯等《混沌七鉴》,陈忠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Briggs, J., et al. *Seven Life Lessons of Chaos*. Trans. Chen Zhong,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Press, 2008.]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陆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Culler, Jonathan.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Trans. Lu Ya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1998.]

Davis, Colin. *After Poststructuralism: Reading, Stories and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04.

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

出版社,1999 年。

[Derrida, Jacques. *Of Grammatology*. Trans. Wang Tangjia.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9.]

——:《多重立场》,余碧平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4 年。

[———. *Positions*. Trans. She Bip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

[———. *Spectres of Marx*. Trans. He Yi. Beijing: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1999.]

——:《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

[———.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Zhang N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Derrida, Jacques. *Margins of Philosoph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2.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年。

[Eagle,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rans. Wu Xiaoming. Xi'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7.]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年。

[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 Trans. Chen Jiaying,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克里斯蒂娜·豪威尔斯《德里达》,张颖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Howells, Christina. *Derrida, Jacques*. Trans. Zhang Ying, et al. Ha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李杨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Hutcheon, Linda.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Trans. Li Yang, et al.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克里斯托弗·诺里斯《德里达》,吴易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 年。

[Norris, Christopher. *Jacques Derrida*. Trans. Wu Yi. Beijing: Kunlun Press, 1999.]

Sangren, S. "Rhetoric and the Authority of Ethnography." *Current Anthropology* 33 Supplement (1992): 277-96.

朱立元“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文艺理论研究》2(2002): 2-9。

[Zhu, Liyuan. "Beyond the Mode of Thinking in Binary Oppositio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2 (2002): 2-9.]

(责任编辑:王嘉军)